

乙 册

用獨拜



立 流 而 耕 靖 提 意 見
 水 登 府 丁 役 候 夢 薦

北京師範大學交流訪問
1956—1957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八講

B. 瓦. 柯尔尊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六十年代民主主义文学

六十年代解放运动的发展推进了俄罗斯人民日新月异的创造力。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大批的平民知识分子作家或者又被称为六十年的民主主义作家。在这一群作家中有着如此天才的人物标志，如格列布·烏斯賓斯基，尼古拉·烏斯賓斯基，波米雅洛夫斯基，列謝特尼科夫，斯列普佐夫，列维托夫等。高尔基在評定他们在俄罗斯文学中的贡献时写道：这些作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使我们得以認識我們國家的经济生活，它的人民的心理特征，描写了人民的風俗习惯，他们的心情和愿望……」（高尔基俄罗斯文学史，国家文学书籍出版局，莫斯科，1939年，第219頁）。

这些作家以如此的形象、图景和色彩丰富了俄罗斯文学，这些形象、图景和色彩只是在深刻地熟悉俄罗斯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来並看得到的。在六十年代作家的创作中随笔和故事尤其佔有重大的地位。他们力图真实地给人以农民生活中的一切残酷真相的鮮明印象。在他们的作品里也首次出现了如此完整地描写出来的工人形象。

这一切使我们有必要以简述的方式来介绍（虽然只介绍大概情形）六十年代作家的创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格列布·伊凡諾維奇·烏斯賓斯基（1843——1902年）。烏斯賓斯基是萨尔蒂科夫——謝德林和涅克拉索夫的同时代人和战友，也是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继承人，按照列宁的話來說，他是「描写农民生活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頁）

烏斯賓斯基的创作活动展开於六十至八十年代间，正当农奴制残余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关系影响之下已被消灭，古老的宗法制农

村已經破產的時候。從事農業的群眾正處於貧困的境地。同時在俄國的工業中心已經形成了無產階級，他們開始建立起自己的組織來了。

烏斯賓斯基受到了某些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但是，同時他却以自己專寫農民生活的鮮明的現實主義作品駁倒了民粹派有關俄羅斯社會的特殊發展途徑的一切基本論點（即通過村社來實現的論點）。無怪乎普列漢諾夫說，烏斯賓斯基用他自己的作品「簽署了民粹派的死刑判決書」。

列寧在和民粹派觀點進行鬥爭的時候，常常提到烏斯賓斯基的作品。例如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文中，指出了烏斯賓斯基關於農民社會的卓越知識，強調了曾經深刻地揭露過小資產階級農民的世界觀的實質的作家的「宏偉的藝術天才」。

烏斯賓斯基生長於一個官吏家庭，他非常瞭解農民的疾苦和不學無術的官吏社會。他由於經濟困難而沒有能夠畢業於大學，於是他開始寫作。烏斯賓斯基曾為涅克拉索夫的「現代人」工作過很多年，後來則又曾為涅克拉索夫和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所主持的「祖國紀事」雜誌工作過。

烏斯賓斯基的第一部使他得到盛大聲譽的巨型作品是刊載在「現代人」雜誌上的隨筆集「拉斯捷爾雅耶瓦雅街的風俗」（1866年）。

在這一隨筆集中作者寫出了不可挽救的貧困的可怕景象，處於這種貧困的壓力之下的是外省一個小城中的一條街——拉斯捷爾雅耶瓦雅街——上的居民。在這裡居住着小官吏、小市民、工戍部队的士兵以及各種各樣的匠人。他們住在潮濕的，行將倒塌的草房裡，自己辛勤所得的是極少數的錢，而且永遠要為生存進行着鬥爭。在普通人的面前開辟着兩條道路：或者是處於完全破產的地步，成了小酒館主人的俘虜永遠狂飲無度，或者是力圖騎在別人脖子上面把別人弄到破產地步。

在随笔里对掠夺者普罗霍尔·保尔菲雷奇的生活的描写佔有着极大的地位，他以全力持向牺牲别人而达到「富裕」起来的目的。他利用了穷人对于飲酒的不可克制的爱好，以贱价收买了各种东西，作各种的卑鄙行为，以实现他的「骄」在俄工人们的「脖子上」的梦想。

在这种环境里像保尔菲雷奇那样卑鄙小人却大大地成功了。这里出现了暴政，粗暴的专制魔王像官吏托洛孔尼柯夫那样的人。他疯狂地恫嚇自己的妻子，要求她绝对依順他一切的任性行为。

在这种环境里还有如此粗鄙的人像冒充有学问的医生的酒徒赫利布諾夫。

作者不企图作冗長的描写。随笔的意义在於，它首次告诉了广大的讀者群众，当时在俄国存在着如此平凡而又如此可怕的习見的街道和小城市。在沙皇俄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像拉斯捷尔雅耶瓦雅街这样的街道，到处有着正好相同的居民，永恒的嘆息号泣「Кар-па-га!」，难以跋涉的泥泞，酒徒的喊叫和眼泪。整个街作为一条大街——「拉斯捷尔雅耶瓦雅街」呈现於讀者的面前，在这条街上一方面是艰苦的劳动，而另一方面则是不可摆脱的苦惱。

这一作品，在暴露腐朽的小市民世界的力量方面成为了后来高尔基所写的「小城奥古洛夫」和「馬特维依·果日姆雅金的生活」等作品的先驱者。

在故事「哨舍」中，作者成功地创造了整个沙皇制度中的概括性的諷刺形象。在这里描写了一个经过严格訓練的沙皇奴仆，哨兵梅姆列佐夫。这是一个退伍士兵，他以一种驯服的不自觉的力量执行着自己首長的命令——「拖住」，「不放走」。他如此久長地，如此頑強地从事於这种工作，以致只有从他的衣領上才能認出他是一个人來——就是这些衣領使他有异於不說話的禽兽和無生命的物件。

1869年出现了烏斯賓斯基的第二部巨型作品——随笔「破产」，

在这部作品里描写了改革时期的俄国。在这些随笔里描写了工人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的富有表现力的形象，他是一个严肃地考虑着有关剥削问题的工人。他说：「才腹便方的巨贾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财的呢？——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他从工人身上，或者从庄稼汉身上榨取金钱的时候……他们牺牲了我们而盖起了房子，养起了家畜，而我们弟兄所得到的却是 *ночылд* ……」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担心着普通工人的命运。他说「该让普通人呼吸了，已经把戏弄和掠夺得够了……行动起来吧……」。

乌斯宾斯基的这些暴露性的作品获得了当时读者们的广泛反应。

乌斯宾斯基曾经多次到过外国——到过比利时，法国。在那些地方他也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困苦状况。他访问了枪斃法国巴黎公社社员的地方，这在他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作者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关系、咒诅了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他立刻感到了普鲁士军潮的兽性的意图。

在一系列的故事中——如「站起来了」等——乌斯宾斯基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真面目。作者更加注意于详细观察俄国千百万农民的生活，这些农民在1861年以后似乎是获得了「解放」，但是并没有得到土地而走上了完全破产的道路。农民的命运，这是乌斯宾斯基写下列许多作品的基本主题——如「克尼日卡·契可夫」，「农民和农民的劳动」，「土地的威力」，「实际的数字」等。

作者指出了，农民落入了商人和工厂主的魔掌中，商人和工厂主充分地奴役着他们。过去农村公社的残余已经瓦解，在农民社会里开始迅速分化，出现了富农和彻底破产的农民群众。在随笔「土地的威力」一文中，作者创造了这种破产了的农民伊凡·波西赫的鲜明形象。

同时，乌斯宾斯基企图在他的作品里创造出典型的农民形象，这种农民为了祇是对他一家有利的一块耕地，一头家畜，就不愿意

参加斗争。作者号召要为解放这些农民，使他们不受金钱的腐蚀影响而斗争。在这里反映了民粹主义的幻想。但是烏斯賓斯基看得很清楚，「土地的威力」是被「资本的威力」压倒的。在他的随笔里和故事里，他一再地描写了农民的破产情况——如随笔「实际的数字」，「小资产者」，「四分之一的馬」等。

在随笔「四分之一的馬」里，他提示了没有馬的农民的艰苦生活的可怕景象，因为按照统计数字这样的农民只能得到一匹馬的四分之一。

烏斯賓斯基所描绘的令人愤怒的、暴露性的情景引起了讀者們對於存在着的制度的憎恨。烏斯賓斯基死后，1902年列宁的「火星报」曾经写道，即使在烏斯賓斯基，这一个具有敏锐智慧，动人真诚和巨大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里是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还是为「接受新的，指出了出路的革命世界观扫清了道路」。

另一个在创作中有着坚定的民主主义基础的六十年代的伟大现实主义者是尼古拉·盖拉西莫维奇·波米雅洛夫斯基。（1835——1863年）。他出身於下级僧侣社会，他在正教学校——「神学校」——和正教中学中度过多年的生活。在神学校里，基本的教育方法是鞭打，基本的学习方法是無意义地死读神学课文。神学校的暴行以及暴虐的充满了揶揄的生活强烈地損害着波米雅洛夫斯基，使他习惯於以犯罪行为来求得忘記现实。

在正教中学里他不顾禁規，开始阅读非宗教性的书籍。民主主义的思潮也开始渗进了这里。波米雅洛夫斯基开始写作，而到1857年结束正教中学的学业时，他已经完全放棄了从事宗教事业的思想了。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影响之下，他开始摆脱了宗教的世界观而委身於教育工作。

波米雅洛夫斯基于1861年在「现代人」杂志中发表了中篇小说「小市民的幸福」，其后又发表了另一篇中篇小说「莫洛托夫」並

成为了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在以后的许多年代中他发表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神学校随笔》并开始写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兄弟和姊妹》。此后的工作，由于《现代人》的封闭和垂尔尼雪夫斯基的被捕就中断了。政府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作者与这个运动是有联系的），使他受到了极强烈的影响。他脱离了事业，并于二十九岁的那一年便过早地，在自己创作活动刚开始时就夭折了。

波米雅洛夫斯基的创作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实际地研究了如何去创造《新人》形象的那些首批俄罗斯作家中的一个。同时他也继续了这个时期里的民主主义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创造现实主义的描写。

波米雅洛夫斯基在自己的创作当中认为必须将主要的打击从公开的农奴制拥护者，如地主涅格罗夫之流（赫尔岑的《是谁之罪？》）的身上转移到自由派地主身上来，因为公开的农奴制拥护者们已经为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他们在1861年的改革以后就已经开始退出舞台了。自由派地主们开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为他们善于很巧妙地把自已伪装起来。作家在中篇小说《小市民的幸福》中描写了这样的地主。这也便是奥布罗西莫夫一家，作家用民主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莫洛托夫去和他们作一对比。平民知识分子争取物质上的独立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但只有当这种意图不会把一个人引导到自己狭隘利益的小圈子里去的时候才是如此。平民知识分子莫洛托夫便是这样。而波米雅洛夫斯基自己呢则探寻着一种新的发展途径，但是他却又不能把它指示出来。

著名的中篇小说《神学校随笔》开始成为描写当时中等宗教学校生活的最鲜明突出的作品了。一般地说，这个随笔性质的著作乃是六十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在自己的随笔中波米雅洛夫斯基用着仇恨的心情描写了在神学校中所施行的那种使人脑筋钝化的可怕的制度。残暴无知的，终日都喝得烂醉的教员们用

各种各样的惩罚来强使少年们学习那不切实际的「神学」。这种制度远非所有的人都能经受得住，因此许多人便腐化了毁灭了。而另一些人则冲破了困难，努力争取真正的知识并成为无神论者。

作者根据真实的事实，根据自己在神学校学习时期里所见的残余现象对神学校的教养中的许多消极现象作出了广泛的概括，并对在神学校中所施行的那种「教育制度」给予尖锐的批评。此外，作者在神学校的内部生活的各种现象中看出了对当时整个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反映。他直接地宣告“在生活中也是那么一个全样的神学校”。

「神学校随笔」是和贵族作家们，如奥克萨科夫和几托尔斯泰等人所写的关于自己童年的自传体的作品相对立的。在他们的作品当中，童年乃是愉快和幸福的时辰。在波米雅洛夫斯基的特写中，童年乃是可怕的时期，这种童年予人以最沉痛的回忆。

「神学校随笔」的特点是它没有一个以他的故事作为整个作品的主题中心的那种主角。在随笔中我们可以看到偶然出现的那些神学校学生中的个别人物如卡拉西，塔夫里亚，和戈洛布涅果达特斯基等。在随笔中有许多戏剧性和喜剧性的因素。这是广大的读者们差不多都还没有见过的。这不是一些应当进行治疗和矫正的，而是应当连根剔除的生活中的真实情况。皮萨列夫在自己的著名论文“已经毁灭的和正在毁灭的”一文中就正是这样来理解「神学校随笔」的。

在给与波米雅洛夫斯基的创作以高度的评价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的是他对农民革命的理解，仍然没有达到卓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发展水平的。他坚决地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捍卫了这种立场，使它不受各色各样的反动和自由主义的力量所攻击。

波米雅洛夫斯基的作品语言是尖锐的，而且有些粗糙。但是他所描写的却是现实的情景而没有把它加以粉饰和研磨。波米雅洛夫斯基的作品也和其他的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一样，在他们死后的

几十年当中都遭受查禁，在图书馆和阅览室的书目中是不能够它们列入的。

和烏斯賓斯基一样，波米雅洛夫斯基对后期的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例如，当M. 高尔基指出波米雅洛夫斯基，格列布·烏斯賓斯基和列謝特尼科夫在他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时写道：「可能的是波米雅洛夫斯基对我的「影响」比列謝特尼科夫和烏斯賓斯基更大一些。他首先坚决地反对了旧式贵族的文学教堂，他第一个坚决地给文学家们指出了「研究生活中一切部门」的必要性，即研究乞丐，消防队员，小店主和流浪者等的必要性。」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烏斯賓斯基（1837——1839）也是六十年代民主主义作家中的一个。他生長在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中，他看見了农民的穷困和痛苦，在很早的时候便認識了被富农和僧侶們蹂躪的农民的真实生活。也和波米雅洛夫斯基一样，他在神学校中讀过书，而在最后則对神学校中的学科感到失望，他醉心于文学並企图进行写作。他离开了图拉神学校，进入了彼得堡外科医学院，然后又轉入了彼得堡大学的历史——語言系，但不久他同样也离开了这里。在H·烏斯賓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現代人」交往之前，他打算在各杂志上发表随笔的尝试一直没有获得成功。在「現代人」杂志社里，人们是了解这位青年作家的並对他给予了支持。他发表了許多的小說和特写：「美好的生活」，「奶猪」，「蛇」，「梨」，「乡村的藥舖」，「載貨車」和「旅人」等々。

1861年涅克拉索夫帮助了H·烏斯賓斯基到欧洲去旅行。使作家首先感到触目心惊的是西方國家里的人民的貧困。

H·烏斯賓斯基很好地了解，自由主义者們所焦急等待的1861年的改革，並沒有給广大的农民帶來好处。但同时H·烏斯賓斯基对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理想又抱着袖手旁觀的态度而且不了解自己的創作和解放运动的联系。在政府对「現代人」和它的編輯部施

行高压政策的时候H·烏斯賓斯基就完全和該杂志断绝了关系並过着飄泊的生活，在许多地方作教員的工作。同时他並在各种杂志当中继续发表自己的特写和小说。离开「現代人」和它的主要活动家们对H·烏斯賓斯基来说是一个致命伤。他以对革命民主主义者們进行激烈的毀謗结束了自己的文学生涯而且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H·烏斯賓斯基的优秀作品描写的是改革以后的俄罗斯生活。地主們看見旧式头像和农奴們日益处于破裂的境地因此他们就感到自己的处境的不妙。而农民呢，由于他们没有土地，同样也看不到他们摆脱飢寒交迫的困境的出路是什么。短篇小說「載貨車」写得非常淋漓尽致。在这部小說中描写了农民的备受压抑和毫無保障的情景。一个过路的剛暴的地主老爺开枪把农民的馬射死，这样就註定使它的主人及其全家餓死。

在这种普遍破产的条件下佔便宜的仅仅是商人和厂主們，因为大批不付代价的劳动力都投奔到他们这里来了。富农們因大量收買破产地主和农民的士地而发财致富了。在短篇小說「美好的生活」当中就描写了这样的一个开酒店的豪农。他使农民喝酒並使全村的人都墮落了。在短篇小說「費多尔·彼得罗维奇」中描写了全村的人是怎樣被費多尔·彼得罗维奇的債務累住，就好像蒼蠅陷落在蜘蛛網里一样，因此只要酒館主人走到債務人的院子里去，他就可以获得任何一个牲畜了。酒館主人將所有的农民都剝削得精光，他囤集了粮食，牲畜，購買了草地和森林。

而某些地主呢就找到了力量去把自己的经济按照新的資本主义的方式加以改建，他們設立工厂，使农民服从自己，使他們在各种方式上去仰賴於自己的領地並力圖保留农奴制度的残余。关于这一点H·烏斯賓斯基在短篇小說「总是老一套」和「叶戈爾卡的牧童」等当中就已经写到了。

作者在许多短篇小说里描写了和人民比较接近並深知其疾苦的乡村知识分子，这些小说是：「乡村教师」，「考试」和「夜宿」等。

虽然H·烏斯宾斯基的作品是很零碎和篇幅不长，但总的来说它们就构成了改革以后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非常生动的图画。

为了避免严格的审查，H·烏斯宾斯基就经常在小说中插入了各种各样的带揭发性的情节和片断，乍看起来，这些情节和片断好象是不甚紧要的。

H·烏斯宾斯基的作品接近於人民的生活，这点使車尔尼雪夫斯基有可能以它为基础而写出有纲领性和批判性的论文「改革不是已开始了嗎？」在这篇论文里作者提出关于文学和人民的解放斗争相联系的问题。車尔尼雪夫斯基谈到民主主义文学必须发展革命的观点。但是，H·烏斯宾斯基並沒有沿着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提示的道路走，只是局限於描写由於反人民的制度所产生的驯服和保守習性。

虽然，H·烏斯宾斯基的世界观有局限性，但他早年的作品对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民主主义文学的行列里还有华西里·亚历克謝也维奇·斯列普卓夫（一八三六——一八七八）。与六十年代的作家不全，他的出身是和古老的貴族有联系的。可是，按其自己的境况地位来说，他是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莫斯科中学，平兹貴族学院（这是以征集得农税而供养食宿的学院），

这里被开除之後就进大学，这就是斯列普卓夫的发展阶段。對於剧院的喜爱使他不能结束大学的学习。後來他和「現代人」雜誌的撰稿人很接近，並且成了这雜誌的經常的撰稿人，成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和萨尔蒂科夫——謝德林的助手。

斯列普卓夫写了若干短篇小说，特写和中篇「困难的时刻」。

他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和一些热狂者在互助会的基础上，以「旗社」为名组织了一个（协会）。这个协会的活动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一八六六年斯列普卓夫被逮捕並关进监牢。

斯列普卓夫在自己短促的一生中的最後几年里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

斯列普卓夫的创作的篇幅不大，但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这位作家新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一般来说，斯列普卓夫所选择的是在他以前没有涉及到的一些主题——从高尔基写道——他描写工厂里的工人，描写彼得堡的街道生活；他的特写充满着对国家的遥远的未来的暗示，也许是無意識的暗示，还充满着当时还捉摸不到的生动思想。」高尔基指出斯列普卓夫的作品和稍後的丁·烏斯賓斯基，列维托夫等人的作品的联系。

——斯列普卓夫和H·烏斯賓斯基一样是契訶夫的直接先驱者，後者对斯列普卓夫的天才评价很高。

从以「符拉基米尔卡和克里亚斯瑪」为总名称的旅途特写开始，他就让读者熟悉丧失土地和在土地上劳动的可能性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成为雇佣工人，遭到野兽般的剥削。斯列普卓夫並沒有只停留在揭露当时生活的消极的一面和登記一些生活现象，而更进了一步並且作出判决。他揭露新出現的资本家和自由主义的地主们的一切形式的阴谋詭計，他们是以响亮的言詞来掩盖自己的一切欺詐（「关于阿斯达士科夫的信」）。

但斯列普卓夫享有盛誉首先是作为「养育者」，「止宿处」，「猪」，「黄昏」等短篇小说的作者。在「止宿处」里他描写了在工作时间内也被監視着的农民。不敢希望公平，他答应给司书一盧布，目的是使他能脱身回家，回到無人照顧的孩子身边。

斯列普卓夫的短篇小说是描写市民生活（「在鉄路上」，「在警察局里的情景」）和地主的生活（「黄昏」），斯列普卓夫的短

短篇小说是由若干个场面和对白组成的，常常是缺乏统一情节的不大的草图。但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从外表上的无秩序的对白和场面的堆积中看出整幅的画面来，并且引导读者严肃地考虑问题和得出结论。因此在斯列普卓夫的短篇小说中经常可看到光辉的幽默。

但是斯列普卓夫只有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小说《怎么办？》之后所写的中篇《困难的时刻》里才成功地创造出大规模的完整的人物形象。

这个中篇是在这样的时候里出现的：对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命运最困难的时候，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反动势力转入进攻并疯狂地诽谤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中篇里创造“革命民主主义者里亚桑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之一的形象。里亚桑诺夫和一个完全满足于一八六一年农民改革的结果的自由主义者谢奎尼内德争辩。作者通过这场争辩引导读者做出结论，就是必须根本改变社会关系，《必须创造新生活》。

但里亚桑诺夫曾几次受到挫折，并且不能够参加积极地改造周围的鄙视现实的活动。

列维托夫的中篇小说里有着对当代最迫切的问题的政治性的评论，广泛地运用了讽刺，为的是在当时情况下使被禁示的思想得以逃避检查机关的耳目。

斯列普卓夫的作品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中是巨大的成就。

按自己创作的性质来说斯列普卓夫相近的是费陀尔·米哈洛维奇·列谢特尼科夫（1841——1871）他渡过了孤苦伶仃的童年，后来又做县法院的录事。在中学毕业以后列谢特尼科夫开始写作，年青作家创作中重要的一步是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波德里普村的人们”它立刻把他引入民主阵营进步作家群中。列谢特尼科夫继续研究乌拉尔工厂工人们的生活，并创作了长篇小说“矿工”，1865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开始刊登。由于政府的迫害

長篇小說未能全部發表，它最後一部分遺失了。

後來作者還寫了兩部長篇小說“那里更好些”，和“自己的麵包”，以及許多隨筆。

別林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追隨者列謝特尼科夫將農民和工人的生活作為自己作品的基本主題。

在中篇小說“波德里普村的人們”中作者創造了一個波德里普村完全破產時的形象。在波德里普村人中特別突出的是農民的形象——皮拉和守索卡。B. A. 列寧認為，在飢餓的，衣衫襤褸的守索卡之後有着整個改革時的俄羅斯農村。

作者指出，正是在被可怕的貧窮壓迫着的人們，死於飢餓的人們之中激起了反抗。誠然，他還沒意識到，但這最初的閃光已顯示了希望。皮拉的孩子們——巴維爾和伊萬——成為工人，並有着思考和批判周圍事物的才能。

破產了的離開自己鄉村的農民們所經受的貧窮使得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之中較堅強者的領導下，例如皮拉，他們結合成一個集體，出外尋找工作，他們成為繃夫了。

波德里普村的年青的一代，雖然還沒有革命思想，但為這思想開闢了道路，獲得知識，傾心於書籍。

列謝特尼科夫藝術作品的語言充滿了方言，作者力圖深入英雄人物的心理。

作者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礦工”和“格路莫夫一家”中更全面地表現出工人的生活 and 情緒。列謝特尼科夫的經驗幫助高爾基創作描寫工人階級的作品。

在“礦工”中列謝特尼科夫描寫烏拉爾工人多克明卓夫家庭的命運。這都是些處於無人性的勞動條件中的普通人，他們工作至精疲力盡，受毒打，和不幸事故的威脅。但工人們表現出某些獨立性，起而反抗上級，思索自己悲慘的，被壓迫的境遇的原因。

在小说中佔绝大部分的是手艺者伊里波罗特尼科夫的儿子的命运的描写，他力图了解为什么在这社会中人不能得到个人自由。但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经受着压榨的工人群众，他们在为自己寻找沉重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出路。

在長篇小说“格路莫夫一家”中，列謝特尼科夫已表示出在自己先进的人们——格路莫夫和柯察金，以及平民知识分子彼得庫尔諾索夫——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们的自发性的反抗。

在对60年代民主作家们的创作做出总的结论时，应该注意他们是非常接近人民的、並很好地知道所描写的人们。他们以许多新的形象和图景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真实地刻画了农民的和正产生着的工人的命运。

以自己创作的基本体裁写作了随笔和故事，作家——民主主义者們加强了这种实际体裁的意义，並以这些使进步文学与人民生活更相接近。这些作家们促使当代进步作家的注意力更多地从描写貴族的生活轉到与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界命运相关的新的主题上去。

60年代作家们的创作对于后来的作家们以及革命思想的发展有着極大的意义。